

三國志叢考

中華學術叢書

吳金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國志叢考

中華學術叢書

吳金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三國志叢考 / 吳金華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12

(中華學術叢書)

ISBN 7-5325-2879-0

I. 三 ... II. 吳... III. 三國志 - 版本 - 考証
IV. G256.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0) 第 86885 號

中華學術叢書

三國志叢考

吳金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韻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10.75 插頁 5 字數 257,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100

ISBN 7-5325-2879-0

K·320 定價: 19.00 元

弁 言

(一)

《三國志叢考》是我近幾年從事課題研究的一部分結果。本書由十篇文章組成，這些論文曾陸續發表過，這次借結集出版的機會，又作了修改和補充。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指教。

(二)

二十世紀是《三國志》整理研究成果層見疊出、異彩紛呈的時代。僅就《三國志》文本的校理而言，完成於三十年代的重要成果就有易培基《三國志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 1955）、盧弼《三國志集解》（古籍出版社 1957）、張元濟《三國志校勘記》（商務印書館 1999）三種。毫無疑問，從文化學術史的角度深入認識這些成果的歷史價值和現代意義，是我們不斷推進研究起點的重要途徑。鑒於易氏《補注》至今尚屬鮮為人知的一種，《叢考》收錄了討論《補注》的兩篇文章。

《略論易氏〈三國志補注〉》是 1998 年 5 月在“海峽兩岸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後來發表於《孔孟學報》第 76 期。《易氏〈三國志補注〉今證》作為前文的補充，撰成於 1999

年5月，已爲《學術集林》第18卷所錄用。在筆者看來，易氏長於目錄版本之學，他特別注重版本異文的著錄，爲《三國志》的校勘提供了前所未見的豐富資料，其中許多重要資料爲盧弼《集解》所未收；在校勘工作上，易氏的獨特發現雖然不多，但有些內容至今還十分新鮮。此外，易氏曾研究過金石文字之學，在《三國志》的訓詁方面時有灼見，儘管其論證未能展開，但不少見解都富有啓發意義。

必須說明的是，這兩篇文章旨在揭示《補注》的歷史貢獻和實用價值，對它的嚴重缺陷則略而不論。其實，《補注》作爲易培基創業未半的書稿，其書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顯得十分粗糙；又由於易氏的工作是在不熟悉前人成果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歷時雖久而所得甚微。關於《補注》的缺點，我在《易氏〈三國志補注〉評述》一文中作了探討，此文將發表於《復旦學報》2000年第6期，未及收入本集。

(三)

流布於海內外的《三國志集解》，是盧弼的精心之作；此書博大精深，其成就與功用之大，非同類著作所能望其項背。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儘管《集解》一版再版，但學術界對此書的了解和利用並不充分。舉兩個明顯的例子：一是以往論及《集解》的文章，對於1967年去世的盧弼都不甚了然；二是最近推出的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魏文帝集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甚至把盧弼當成清代學者，以至該書的注文中多次出現“清盧弼《三國志集解》”的字樣。至於《集解》的開發和利用，更有待於深入的研究。如果調查一下此後出版的《三國志》校點本及各種今注今譯本所存在的問題，便不難發現，其中許多疑問都可以從《集解》中找到答案。當

然,《集解》不可能沒有缺點;如果允許我們對里程碑式的巨著責備求全,至少有三點值得一提:第一,盧弼在《三國志》版本的棄取上似乎帶有情緒化色彩,他對名噪一時的晉寫本殘卷、百衲本及易培基推崇的西爽堂本基本上抱着不屑一顧的態度,這就使得《集解》不可能充分反映和利用多種傳本的長處。第二,盧弼不熟悉語言文字的學問,他在採集舊說時遺漏了不少極有價值的內容,例如注音釋義方面忽略了何超《晉書音義》、蕭常《續後漢書》所附音義、郁松年《續後漢書札記》等等。第三,在引證與《三國志》有關的文史哲文獻方面,《集解》還有許多空白,例如史書方面忽略了《梁書》、《建康實錄》之類。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本集收入了《〈三國志集解〉箋記》65000多字,可謂意在附驥,而實為續貂。

(四)

《晉寫本〈魏志·臧洪傳〉殘卷初探》撰成於1988年,原先發表於《古文獻研究文集》第二輯(《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增刊);1995年收入《古文獻研究叢稿》時,本文的初次發表年代由“1989”訛成了“1987”。這次收入《叢考》,不僅更正了《叢稿》的訛誤,還參考新疆博物館李遇春先生文章中公布的資料對本文作了修補。李文題為《吐魯番出土〈三國志·魏書〉和佛經時代的初步研究》,發表於《敦煌學輯刊》1989年第1期,其撰寫及發表年代恰與本文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李文的資料必定來源於晉寫本《魏志·臧洪傳》殘卷的原件,而我依據的僅僅是《新疆歷史文物》的殘卷縮影圖版。由於圖版太小,有些字句難以確認,墨點符號更無法看清,所以初稿的釋文跟新疆博物館收藏的原件不可能完全吻合。讀到李文以後,我才知道從原件中可以看清下述內容:(1)今本《三國志》“故東

宗本州”，殘卷“東宗”下多“宮”字；“宮”旁有三點，以示除去。(2)今本“以徼忠孝”，殘卷“徼”作“邀”。(3)今本“增兵討仇”，殘卷“兵”作“侯”。(4)今本“更引此義”，殘卷“引”作“馱”。(5)今本“可謂順矣”，殘卷“順”作“頂”。關於上述五點，我認為(1)反映了古寫本刪除誤文的實況，(2)反映了“徼”、“邀”二字通用的實況，這兩點現已補入本文；(3)、(4)、(5)則可能反映了古寫本時代的流行字體，例如“兵”作“侯”，我懷疑殘卷的字形很可能是“𠂔”，也就是“兵”字，古人有這種寫法，這種字形跟“侯”相似。

(五)

《〈三國志〉斟議》27000字，原載於《文史》2000年第1輯、第2輯。《〈三國志〉管窺》15000字，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2000年第3輯。《斟議》着筆於1998年，文分六部，例舉九十；原為慶祝“三禮”專家錢小雲(玄)先生九十華誕而作。豈料錢先生於1999年12月3日遽歸道山，沒有看到本文。先生著有《三禮通論》、《三禮辭典》、《三禮名物通釋》、《校勘學》等書。記得先生1988年贈我《校勘學》時說，書中有七處引錄了我以前發表的文章，我打開一看，其中有五處都是校理《三國志》的內容；從此我經常想，為了不辜負先生的厚愛，應爭取有更多的發現。繼《斟議》之後，我又在《管窺》中討論了40個問題。謹以此一組小文，寄託對先生永久的思念。

(六)

《〈三國志校詁〉及〈外編〉訂補》原載《文教資料》1996年第2期及第6期；《〈三國志〉待質錄》原載《文教資料》1998年第2、3、4

期及 1999 年第 1、2 期；《岳麓本〈三國志〉修訂後記》是岳麓書社《三國志》1999 年修訂本的附錄。這三篇文章都是對自己舊作的修正與補充。

《校詁》是 1987 年撰成的，那時我還沒有全面地調查過《三國志》的七種重要版本，還沒有悟出陳乃乾《三國志》校點本（中華書局 1959）的誤文往往來自金陵活字本；岳麓本《三國志》是在百衲本的基礎上校點的，我第一次從事這項工作是 1989 年，那時我還沒有找到易培基的《三國志補注》，也無從知道張元濟的百衲本曾對紹興本、紹熙本做過直接的挖改和修補。《〈校詁〉外編》是 1994 年撰成的，那時我還沒有利用電腦查閱資料的條件。最近幾年，我重讀《三國志》，覺得值得研究的問題似乎越來越多。回過頭來翻翻舊作，發現有些地方已非改不可，有些地方還應當補充。在修改補充的過程中，凡引用今人的某些著述或說法，均隨文交代著者或說者的姓名，這裏不再提名致謝。

（七）

《〈三國志〉語詞瑣記》原載《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一輯（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本文討論《三國志》語詞研究中的盲點、誤點、疑點，內容涉及文本的考察、語詞的考定及詞義的考索。筆者認為，在漢語史研究及辭書編纂等實際工作中，只有充分注意上述問題，我們才有可能避免陷入若干誤區。

（八）

跟《叢考》有關的《三國志》系列課題，曾得到國家教委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的經費資助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

劃課題的經費資助。本書的出版，多蒙上海古籍出版社張曉敏先生給予支持和幫助。對此我表示衷心感謝。

念及本書的寫作緣起，我忘不了南京的業師徐鳴謙（復）先生。二十多年前，徐先生指導我走進了漢語史研究和古文獻整理的學術領域；1986年，當我才發表了十來篇學術論文時，先生就將關於《三國志》語詞考釋的五篇文章結成一組推薦給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評委會，意外的獲獎使我對《三國志》的興趣更加濃厚；此後，先生不但為我的書稿《三國志校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三國志校詁〉外編》（收入《古文獻研究叢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認真作序，還不斷地傳示他的最新學術成果特別是研究《三國志》的心得。如今先生年且九十，我在獻上《叢考》的同時，敬祝先生健康長壽。

回顧本書的寫作過程，我忘不了復旦大學傑出教授章培恒先生。近幾年來，除了漢語史和古文獻學的日常教學工作以外，我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三國志詳解》、《三國志簡注》、《三國志語言研究》、《三國志詞典》等系列項目；章先生作為古籍所所長，提供了許多我從來不曾奢望的支持和幫助，他熱切地期望我能够快出成果。我深感愧疚的是，這部《叢考》雖然基本上解決了課題研究中的重點和難點，但系列項目的總體進度很不理想。我只有加倍努力。

說到本書的完成，我不能不提起同在古籍所工作的內子張敏文女士的協助。多年來，她投入了許多繁雜而又無法簡省的工作，例如《三國志》整理研究資料的調查和收集，各種版本異文的查核與統計，資料卡片的手工製作與電腦操作，等等。《叢考》中只有少數文章對此有所說明，而大多數文章發表時均未提及，現在在這裏做一點補充。

最後輪到交代附錄，《叢考》附錄的《本書重要語詞筆畫索引》

是蘇傑君編製的。編製這種索引既要有細讀書稿之熱情,又要有尋章摘句之耐心,蘇君有此心情,使我非常感動。

吳 金 華

2000年8月於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作者簡介]

吳金華 江蘇省南京市人，1943年11月出生。現為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語言學會理事，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著有《三國志校詁》、《世說新語考釋》、《古文獻研究叢稿》、《古文獻整理與古漢語研究》等。

目 錄

弁言	1
略論易氏《三國志補注》	1
易氏《三國志補注》今證	18
《三國志集解》箋記	53
晉寫本《魏志·臧洪傳》殘卷初探	151
《三國志》斟議	161
《三國志》管窺	198
《三國志校詁》及《外編》訂補	220
《三國志》待質錄	240
岳麓本《三國志》修訂後記	271
《三國志》語詞瑣記	294
本書重要語詞筆畫索引	316

略論易氏《三國志補注》

引 言

易培基(1880—1937)《三國志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 1955 年影印本),是近現代關於《三國志》版本校勘方面的一項成果。

今天,如果以《三國志》整理研究的現狀為背景,用歷史比較的眼光回顧易氏《補注》,我們不難發現,此書在文化學術史上的意義值得探討,對今後《三國志》的校理工作仍有一定的應用價值。章太炎曾稱譽《補注》“揚榷大體,皦然明白,非夫堅守傳刻校勝負於文字間者比也”,柯劭忞稱譽此書“體大思精,證引宏博”^①,在當時並非溢美之辭。筆者要特別指出的是,易氏《補注》的問世雖然已經四十多年了,但它的歷史價值和現代意義還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這可能跟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未廣、許多古籍整理工作者難以看到此書有一定關係^②。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補注》略作評述:一,從易氏著述的宗旨和內容,看《補注》的特色;二,從盧弼(1876—1967)《三國志集解》(古籍出版社 1957 年排印本)的不足,看《補注》的歷史貢獻;三,從陳乃乾(1896—1971)《三國志》校點本(中華書局 1959 年第一版、1982 年第二版)中有待訂補的問題,看《補注》在今後有關工作中的利用價值。

前四史流傳到清末民初，傳本之多，整理研究成果之豐富，已經蔚為大觀。但是，多種傳本流散於海內外，千百年來的學術成果又散見於多種書刊，這就需要進行一次學術性的總結。因此，對前四史進行大規模的會校和集注，為讀者提供最詳瞻的校注本，是那個時代賦予古籍整理工作者的使命。率先投入這項盛事的，是湖南籍學者王先謙，王氏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出了《漢書補注》，民國四年(1915)又刊出了《後漢書集解》；接着，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在昭和九年(1934)撰成了《史記會注考證》；與此同時，湖南籍學者易培基、湖北籍學者盧弼都不約而同地致力於《三國志》的校理。易氏《補注》與盧氏《集解》都大體完成於三十年代中期，為這一階段的前四史的校理畫上了富有歷史感的句號。

易氏字寅村，別號鹿山，湖南長沙人。據近現代人物傳記記載，易氏為學淵博，通經史、小學，旁及金石文字；早年畢業於武昌方言學堂，曾游學日本，歸國後，擔任過高等院校教授、校長，省級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等職；1937年病逝於上海，享年58歲。關於《補注》，大約始創於1898年。易氏以西爽堂本為底本，廣求宋本、元本、明本和唐宋類書進行對校，十年以後，為底本作了四千幾百條注文。此後陸續進行這項工作，直到去世前還沒有繕成書稿。1955年，易氏的遺稿由其哲嗣整理後，交臺北藝文印書館刊行，這實際上是一部創業未半的著述。易氏的本意，是一方面匯列清儒著述並加以選擇，附上按語；一方面則搜集版本和其他資料進行對校。惜乎天不假年，易氏的遺書只基本上完成了後一方面的內容。據我們統計，此書共計六千六百九十八條注文，主要是為讀者提供善本的異文和簡明的按語，只有很少的篇幅涉及到史

評、史例、史證、訓詁等內容。儘管如此，《補注》在自己誕生的時代仍不失為內涵豐富、特色鮮明的大型古籍整理成果。

首先，關於《三國志》傳本的評價和利用，易氏的見解頗具科學的、客觀的精神。當時，海內比較常見的版本有明代的吳氏西爽堂本、南監本、北監本、毛氏汲古閣本和清代的殿本、金陵翻刻汲古閣本、金陵活字本，等等。易氏不取好古、佞古的態度去選擇罕見的宋本、元本，也不取淵源於毛本和南、北監本的清代刻本，而以號稱“明景北宋本”的西爽堂本為底本，是基於這樣的認識：

明景北宋本《三國志》，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同。三《志》各自為卷，目錄分列。“匡”、“恒”、“微”諸字均缺末筆，卷末有“吳氏西爽堂校刻”一行。西爽堂者，吳仲虛琯鑄書之名也。繆藝風亦有此本。因前有朱天錫序言為元刊，未免夸越。然此實勝南、北監及近刻諸本。如《蜀志·先主傳》“分遣將軍吳蘭雷同入武都”，諸本均誤作“城都”，此本不誤。斯類正夥。（見《補注》卷前“丁未春分易培基記”）

在易氏心目中，傳本的淵源要早，傳本的誤文要少，符合這兩個條件的西爽堂本才適宜作會校和集注的底本。就選擇底本的標準而言，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儘管西爽堂本是否完全符合上述標準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如所周知，古書傳寫或刻印的次數越少，增加錯誤的機會也越少；清代有些晚出的刻本，經過專家的整理，固然能發現和改正早期寫本、刻本的許多錯誤，但任何專家都不可能沒有失照之處，而專家整理過的本子上的錯誤是不容易發現的^③。從這個意義上講，西爽堂本作為善本之一，當然值得重視。附帶說一下，盧氏《集解》以金陵翻刻汲古閣本為底本，他在《集解序例》中認為自己所用的底本“後勝於前”，誠然可備一說；但他又說“西爽無足齒數”，憑空貶斥，頗有意氣用事之嫌^④。

其次，易氏致力於版本的對校，為《三國志》的進一步整理研究

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見的校訂資料，這也是《補注》獨具的特色。易氏對自己最初十年(1898—1907)的校訂工作曾有如下的回顧：

十年以來，從事校訂。武昌一校宋本(楊惺吾代借宋嘉定本，不全)。宛平三校北宋本(一海源閣遺書；一馮季立藏書；一書估何厚甫書，不全)。一元池州路本(京師圖書館藏書)。一北雍本(會文堂何厚甫所借)。及晚近返里門，復以南本、毛本、《華陽國志》、《文選》注、《世說新語》、《通典》、《通考》、《冊府》、《文類》、《御覽》、《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孔六帖》諸書對校，補訂刪改，增加至四千數百有奇。陳《志》有書以來，無此緬縷不憚煩者。(見《補注》卷前易氏記)

乍一看，易氏積十年之功的“對校”，只不過是死板而瑣碎的工作，《補注》的大部分内容不過是求得宋、元、明本的異同，然而，這種成績及其意義不宜低估。被譽為“新的中國校勘學的最大成功”的《元典章校補》(陳垣著，初版於1931年)啓示我們：用善本對校，是校勘學的靈魂；校勘學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異同，然後考定其是非；從現代科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古來許多校勘學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孫、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門而不是校書的正軌，其下焉者，只能引學者走上捨版本而空談校勘的迷途；由於過去的學者無力購求善本，又往往不屑於做對校這種機械的笨工作，所以直到二十年代前後，够得上科學的校勘學者實在寥寥無幾^⑤。由此可見，易氏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從對校入手而步入了校書的正軌，他甘心盡力地做一件有《三國志》以來最麻煩的工作，不僅在思想方法上超越了傳統，在工作成績上也填補了前人的空白。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即易氏用於對校的版本和資料，並不限於最初十年的範圍。打開《補注》，最引人注目的對校本還有宋紹興本、紹熙本、晉寫本《吳志》殘卷，這都是清代學者難以見到或不

曾見過資料。在類書方面，易氏對唐宋文獻如《北堂書鈔》、《通志》等等利用得相當充分。以新時代的學術眼光，歡迎一切可資利用的新舊資料，這是易氏超出前人、超出同行專家的又一特點。

此外，《補注》在史評、史例、史證、訓詁等方面也不乏精識卓見。例如有關歷史人物的評論，易氏着眼於曹操本身的虛偽兇殘和用人上的驅貪使詐；有關史書的評價，易氏着眼於陳壽的“直筆”；有關詞語的考釋，易氏着眼於說通假、明古義。凡此種種，多少也展示了其他著作所不能取代的價值和功用。

二

拿易氏《補注》跟盧氏《集解》對照，各自的特色更加顯著。盧氏以清代翻刻的汲古閣本為底本，參考前代學者的考訂成果，徵引浩博，辨證詳明，內容豐富，創獲甚多，尤其精於歷史地理方面的考證。顯而易見，盧氏最突出的貢獻，正是易氏沒有來得及進行的那一方面工作。除此之外，《集解》也有一些版本校勘的內容，並且也有不少發明。從總體上看，《集解》是一部名副其實的《三國志》的最詳注本；易、盧兩書並行於世，文史工作者跟《集解》接觸較多而對《補注》注意不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由於易、盧在思想方法上不完全相同，在學識上又各有專長，所以《補注》和《集解》往往呈現出優勢互補的關係。根據本文的主題，下面只舉例說明《補注》的某些長處。

（一）底本

盧氏所據的金陵翻刻汲古閣本，本身有一些誤文，再加上排印成《集解》本之後又增加一些誤文。參考西爽堂本，對上述誤文的校訂很有幫助：